

比较文学
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中日古代文学 交流史稿

严绍盪
著

比较文学
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中日古代文学 交流史稿

严绍璁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严绍璦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2

(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ISBN 978-7-5334-6795-1

I. ①中… II. ①严… III. ①古典文学—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日本 IV. ①I209 ②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8658 号

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Zhongri Gudai Wenxue Jiaoliu Shigao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

严绍璦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350014)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89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795-1

定 价 66.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 0591-83726019)调换。

英 杰 交 流

三十年日本文学研究的成就与方法国际研讨会





“中国三十年日本文学研究的成就与方法国际研讨会 ——庆贺严绍璗先生七十华诞”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0年8月28日，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同窗会、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清华大学外语系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后援，“中国三十年日本文学研究的成就与方法国际研讨会——庆贺严绍璗先生七十华诞”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宁波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的六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手前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学院大学的七位教授专程前来北京参加本次学术研讨，日本广岛大学校长特派代表到会。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吴志攀依照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的嘱托向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严绍璗深深鞠躬，对他为北京大学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吴志攀说，严绍璗是用生命做学术的人，三十多年来，他焚膏继晷，兢兢业业，打通了数个学科之间的渠道，展现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映像以及日本文化的实像。

大会分两个时段进行，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焦雪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哲俊分别主持了会议。日本学士院学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手前大学校长川本皓嗣，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严安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原克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等分别发表了题为《如何解读诗歌——围绕高杉茂吉的短歌〈我母将逝〉》、《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文本重读和“门外文谈”》、《围绕“虚幻之美”对中日比较文学之考察》、《我是如何进入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我的四十年的学术体验》的主题演讲。与会学者就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研究方法、日本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邱鸣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早稻田大学河野贵美子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宝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志松教授等都先后在大会上发言。

学术界相关专家学者和负责人张黎明、蒋朗朗、陈联红、车槿山、孟华、张辉、安藤阳子、彭广陆、崔文印、王成、刘晓峰、高旭东、张西平、李雪涛、徐一平、王勇、董丙月、李均洋、李岩、黄海存、冯宝志、胡友鸣、顾青、李晨光、金英、乔鲁京、柳霞、陈洁、周以量、王青、钱婉约、张冰、张沛、大野香织、中田妙叶、丹羽香、贺雷、郭勇、李强、周阅、肖伟山、刘萍、王一鸣、古市雅子、牟学苑、涂晓华、秦立彦、蒋洪生、王立群等出席了会议。（王立群）



严绍望先生：

在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
活动中，《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被评为
优秀图书（著作类一等奖），特发此证，
以资鼓励。



集结与阅读：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总序）

编辑与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的目的是基于下以几种缘由，在此我们给予简约的陈述。

2013年6月6日，我与董伯韬博士在网络平台上交换一些学术问题，其中提到了关于出版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书系的设想。的确，我们应该为从“文革”结束以来到当下的优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出版一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出版时丛书命名“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以“文库”的集结形式，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发展给出一种历史性的记忆。

我们在编辑与出版的策略上约定，这套“文库”只收取当代中国优秀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能够见证自己学术实力的代表作，每位选入的学者只提交自己的一部代表作。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位学者有限的学术生命时段，真正的优秀学者所能够从容沉淀且凭借学术良心推出的厚重著作应该只有一部。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学术中所沉淀的厚重性体验与深度性思考仅此可能获有一次，反之是违背人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把这部研究代表作称之为见证学术历史的个人经典——“the best of me”。

按照约定的编辑与出版策略，我们对近 37 年来能够准确定位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遴选，第一批选入了十部专著，作为十位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典给予集结出版。我们在遴选与编辑的过程中，曾得到这十位学者诚恳与无私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库”仅从过去出版且曾在学界产生过影响的专著中进行遴选，而不再接纳任何在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下业已出版的论文集。因为显而易见，一位在学术信仰上谨慎且笃实的学者，愿意让自己沉寂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稳定的时段，就一个论题在文献与理论两个层面做体系性思考而撰写专著，这部专著较之于论文集在逻辑的断片中所给出的阶段性思考要有价值得多。

此次，我们通过遴选与集结出版这套“文库”，在意外的偶然中，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37 年来所行走的学术发展史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到当下的 37 年来，中国学界关涉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人文研究及所堆积的出版物在表象上也只能如此繁华了，无论怎样，所出版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以选家的眼光透过虚妄的繁华，希望真正拣选若干部还能够被定义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专著时，在遴选的质量与数量上，能够感动我们学术良心的专著居然没有多少部。并且我们特别想说明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边界开放的学科，所以我们的遴选绝然不是仅仅规限于以“比较”两个字眼儿为自己命题的专著中展开的，因为至少业内学者都知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一部在学科意识上地道且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往往不需要粘贴“比较”的标签来装饰自己。

我们的遴选涉及了与比较文学交集的相关人文学科及研究领域，本来我们为能够轻松地遴选出五十种或一百种可以定义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所出版的个人经典，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们不禁想在此设问：37 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大跃进”的冒进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第一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当然，这一切还要由中

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来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第一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第一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日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西比较诗学、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下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觐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①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① [梁]萧统：《文选序》，见于《文选李注义疏》（第1册），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0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能否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等等……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得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意识上绝然不同于国别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学研究，我们在此把这两者合称为国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研究。我们不建议一厢情愿地误用国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评价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驻守于国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以集结出版一套“文库”，依凭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以集结出版一套“文库”，两者在交集之间必然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与冲突。我们所论证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就是言指比较视域（comparative perspective）。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倾听国族文学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种种评价，甚至某种评价在对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误读中呈现出并不内行的批评，其实这也全然没有关系；我们想言说的是，我们始终持有这样一种姿态：即双方应该在相互看视的差异性中相互欣赏，并在相互对话中营构一种大度

且包容的学术心态。我们恳切地宣称：国族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一位学者首先只有做好了国族文学研究，才可能走向“四个跨越”的比较文学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选入这套“文库”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们首先都是优秀的国族文学研究者。他们在国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把视域投向国际学界，投向与文学研究具有交集（intersection）的一个异质学科（heterogeneous discipline），以语际（interlingual）与跨界（transboundary）的整合性思考成就了自己的比较视域及比较文学研究。毫无疑问，他们都坚实且准确地拥有把文学研究带向国际学界的比较视域。真正且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是可以自己宣称的，也不需要自己宣称，只要他们的研究视域、学术心态与学术成果达向了语际与跨界的整合性逻辑，恰切地吻合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他就是一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因为他拥有汇通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知识结构，持有两种以上可以阅读的学术语言能力，兼有开放的比较视域与多元的学术心态等。

多年来，不少青年学者在报考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硕士生、博士生时，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常常提出要导师开具一张在这个研究方向下积累知识结构与锻造比较视域的基本必读书单。从学科性质上来讲求，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要求很高的学科，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是在语际与跨界中淡化其学科边界的，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还可以界分出多种从属性研究方向，所以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无法开出一张包打天下的基本必读书单。然而链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的从属性研究方向，无论是怎样的开放与多元，任何比较文学研究者均需要准确地获取地道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在这一点上，对任何一位走进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讲，都是共通且公平的。

我们编辑与出版这套“文库”，也正是希望为相关青年学者提供一套了解与把握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基本系列读本，以便比较文学研究的代际性发展能够在准确的学科理论中有序化、学理化与逻辑化的行进。当然，这一学科意识是在不同的比较文学个案研究中呈现出来的。

集结于这套“文库”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们是在不同的文学个案

研究中呈现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他们都是优秀的当代学者；他们曾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的不同阶段，以自己的学术良知留下了个人思考的足迹，所以入选这套“文库”的个人经典，分别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讨论隋朝一统天下后南北经学的统一与分野时认为：“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①在学术与世运之间，无论存在着怎样的转移与不转移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维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学术。因此，我们主张读者能够恰切地在学术与世运之间给出自己的选择，带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维系眼光，对这套“文库”的专著给出自己的阅读、判断与接受。我们再三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于“文库”的集结形式，为希望从事或正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一张关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的必读书目。这张必读书目还需要仰仗优秀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对自己的一部个人经典的推介，还需要仰仗出版社推出第二批的十部与第三批的十部……使这张必读书目逐渐地丰富且完善起来，以沉稳地绘出一张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学术地图。对于那些希望走进比较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及他们的阅读期待来说，我想在未来的坚持中能够遴选与出版三十种或五十种就足够了。

注意，我们在修辞上使用了“the best of me”这样一个术语以隐喻的方法指称“个人经典”，在这套“文库”的遴选与集结的语境下，我们必然要把“the best of me”在逻辑上链接与定位在“canon”的语义场中，而“canon”的汉语译入语就是“经典”。

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以三重定义的方法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下定义时，在第三个层面上认为：“世界文

①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学不是文本的一种固定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World literature is not a set canon of texts but a mode of reading）。”^①严格地讲，按照学术的形式逻辑规则，任何一位学者在给一个学术概念下定义时，应该使用肯定句式，而必须拒绝使用否定性的语言表达式，因为那种操用否定性的思路以排除与被定义概念无关的诸种元素，最终迂回地达向被定义概念的本质，这无疑是一种反逻辑的思考，这也是形式逻辑在理论上所给予拒绝的。但无论如何，大卫·达姆罗什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那些在世界文学名义下被尊称为经典（canon）的作品，需要处在不间断的被阅读中，以读者的持续性阅读给予作品之经典身份的激活，否则一部被曾经称之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作品退出阅读后，它只有在寂寞中沉落，失去经典的本质。其实，曾经被称之为学术著作的经典也依然如此。学术著作的经典本质是变动不居的，而不是固定的，它们必须不间断地处在被阅读的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才能被历史的当下性阅读激活且守护其经典的本质。我们编辑与出版这套“文库”，也更是以集中的方式为相关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使选入这套“文库”的个人经典时时能够处在被阅读与被参考的当下语境中，以此也能够激活与回忆那个时代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学术氛围，同时，也葆有选入这套“文库”之专著的经典性学术生命力。所以仅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我们绝然不是在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上固执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经典定义者。

当然，这一切也要依凭选入这套“文库”之专著本然的学术品质。

说到底，学术经典也是一种阅读模式，阅读激活了这些学术经典，也激活了那个时代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有效地推动了当下代际性读者的知识积累与学术思考。我们当下所遭遇的是一个拒绝阅读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拒绝纸本阅读的时代，更不要说阅读学术经典了，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以修订的再版优

① [美] 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

秀专著与当下的阅读来守护历史上的学术经典呢？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开放性，比较文学研究以其大度与宽容的姿态接纳了尽可能多的周边学科及其优秀学者集结于这个领域，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开放性不仅推动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心态及其学术信息。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锻造一种专业的视域，而图书出版也需要获取一种专业的眼光。福建教育出版社愿意以自己盈余的经济实力，资助出版这套纯然学术性的“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而不求取出版利润的回报，这着实令人敬重。这无疑是一种气魄！因为，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榨取学者血汗的出版人。

较之于某些出版人招摇着出版论文与专著的学术旗号，在斤斤计较中收取高额出版经费，这种气魄在职业的人格上要伟岸得多；较之于某些出版人为获取高额出版利润，出版媚俗读物以抓取大众眼球，这种气魄在职业的人格上要圣洁得多。

最后，我们感谢推动这套“文库”出版的策划人董伯韬博士与编辑李杨女士，他们为这套“文库”的出版投入了持久的热情与不懈的努力，从他们与这套“文库”作者们的反复交流中，我们全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学术信仰的忠诚与守护。时下，愿意和能够在书的审读与设计投入如此多智慧、学识与心思的编辑并不多。

杨乃乔

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光华楼

2014年7月22日

前 言

严绍璿

双边文学研究或多边文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常常会面临一些危险。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为观念与视野所限，不经意地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学现象振振有词地发表见解，自然会受到饱学之士的讥评，双边文学研究的名声，因此也就会被败坏；另一方面是执着于民族主义情绪的研究家，常常把对揭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的联系、排斥、包融和反馈的诸种研究，斥之为意在否定作家与作品的“个性”、试图抹煞文学的“民族性”等等。从事这一研究，有时不得不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岂不让人如履薄冰，胆战心惊。

古代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阐发这种业已存在了千余年的文学现象，便常常会遇上这些危险。

古代日本是属于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但是，它的文学，却是在与中国很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内发展起来的。一般人都认为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儒学思想影响的国家。直到今天，人们甚至还称日本是一种“儒教主义”的社会。但是，如果体察日本文化的深层内容，那么，似乎可以说，儒学对于日本社会的影响，是远远比不过佛教的作用。在律令制时代，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制

度和政治思想方面，它始终未能真正地透入民众的生活意识之中。即使在江户时代，幕府定程朱之学为国家哲学，但是，这一时代，社会上恰是人欲横流；文学作品，充溢着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与程朱之说，南辕而北辙。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日本文学，作家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欣赏心理，都具有与中国文学很不相同的内容和形式，两者在气质上的差异是显著的。

与中国古代的“诗教”之说、中世时代的“文以载道”论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观念不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就远离政治，它主要是作为一种纯粹表达感情和调剂精神享受的手段，故而，也就绝少见如中国文坛那样，作家诗人由文学获取功名，晋升精英阶层的情景。日本民族对于文学的这种根本观念，造成日本古代文学耽于唯美的内容和形式而不能自拔，追求所谓“物哀”“幽玄”和“寂静”等相融或相通的境界，以求表达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朴、典雅和自然返真等气质，由此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曾兴起过“兴亚论”，其功过是非，已由历史做了判定，无须我们在这里再说什么。“兴亚论”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在文化方面投下的影子，却是不可忽视的。所谓中日民族“同文同种”的宣传，始起于日本，呼应于中国，渗透于中日两国双边文学的研究之中。这种观念的潜在的侵蚀，至今时有显现，实在是我们要警惕的危险。

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研究家们的注目。古代日本书面文学的形成，如果以《古事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大约是在公元八世纪左右。其时，中国文学正处于唐代极其繁荣昌盛的时期。换言之，日本古代书面文学是在中国以《诗经》等为代表的书面文学发展一千余年之后才开始起步的，但是，到十九世纪中叶，两国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大致相当的水平。当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之后，它却于中国文学之前，跨入了现代文学的行列。何以起步晚而进步在先呢？这实在是一个足以使研究家们深长思之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概涉及日本古代文学的性质——指存在于这一文学深处的一种内在动力。如果从发生学的立场来考察，那么，可以说，日本古代文学是一种“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多边文化”或“双边文化”研究中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

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是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日本古代文学作为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在其一千余年的发展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显得特别活跃，几乎没有停滞的阶段。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

日本古代文学的这一根本的变异特征，便造成了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会合。

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阶段，与整个文化的发展相一致。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原始文化（文学）阶段（原始时代—公元四至五世纪）；

飞鸟奈良文化（文学）阶段（公元五世纪—公元八世纪）；

平安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八世纪末—公元十二世纪）；

五山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十三世纪—公元十六世纪）；

江户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十七世纪—公元十九世纪）。

日本作为一个偏居于亚洲最东部的海中岛国，它对大陆上的一切知识，都具有新鲜感。毋庸讳言，在古代亚洲大陆，中国文化与日本相比较，长期处于高层次的阶段。中国文化（包括文学）上所获得的成果与经验，是日本古代文学实行自身变异的主要材料。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文学样式的相互联系中，几乎都与中国文化的会合密切相关。这里丝毫也不否定民族文学发展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学本身的诸因素。文学的因素便包含了文化会合的条件。

在双边文学与多边文学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情绪是最应该避免的揭示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特别是探明中日文化与文学会合的轨迹，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日本古代文学的民族特性。文学的“民族性”从来也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日本文学“民族性”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一文学内部的“变异